中国关键方言探讨及其使用状况调查：以客家话为例*

上海海事大学 外国语学院 张治国
上海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 胡舒琪

提 要：本文提出了关键语言体系，并就该体系中的关键方言进行了基本概念的理论阐述。依此，我们能推定客家话为我国的关键方言。然后，本文根据斯波斯基的语言域理论以广东梅州客家话为例调查分析了我国关键方言的使用现状。结果表明，客家话的使用主要在常见语言域，其使用分量从多到少依次是家庭域、公共域、工作域和学校域，而且，客家话的使用还出现了代际式微的现象。最后，文章指出，在世界众多小语言和方言式微的大环境下进行关键方言的学术研究和规划是必要的；我国关键方言的维持和使用要靠常见语言域；我们要加强关键方言的声望建设，以便人们可以形成更加正面的方言意识形态。

关键词：关键方言；语言维持；语言域；客家话；广东梅州

1 引言

关键语言（critical language）一词源自美国，是指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存安全或总体发展的语言，因此，对关键语言开展研究或规划就显得非常必要和重要。近年来，这一主题引起了我国学界一些学者的关注。例如，张治国（2011，2022）和张天伟（2015）对我国的关键外语进行过学术探讨，而王建勤（2010）、李艳红（2016）和刘美兰（2016）则对美国的关键语言（其实就是关键外语）计划做过历时述评；张天伟和陈练文（2023）、董希骁（2023）都对关键语言的理解和选择提出过自己的一些独特看法；张治国（2023）还对我国的关键跨境语言开展了多维的选择和分类研究。此外，对于任何国家而言，没有什么语言比本国的语言（尤其是国语或官方语言）更“关键”了（张治国，2022）[2]。可见，根据语源，关键语言包括内源性（endogenous）、外源性（exogenous）和双源性（bigenous）关键语言，它们可形成关键语言体系（见图 1）。内源性关键语言表现为本国的国语或官方语言（多数国家仅有一门国语或官方语言，故无须在“国语”或“官方语言”前面加“关键”一词）、关键方言和关键少数民族语言；而外源性和双源性关键语言则分别表现为关键外语和关键跨境语言。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家外语能力指数构建和中国关键外语战略研究”（项目编号：22AYY011）的阶段性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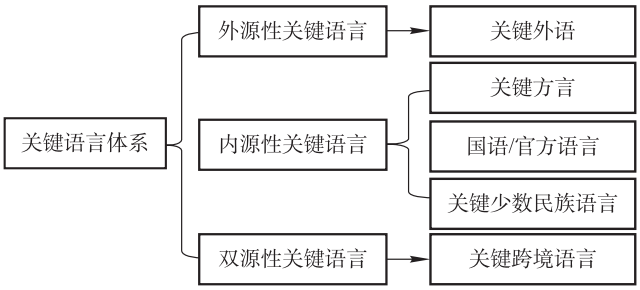


图 1　关键语言体系

在我国关键语言体系的研究中，关键方言的研究实属罕见。为此，本文拟对我国的关键方言进行一些尝试性的学术探讨：首先，在理论层面阐明关键方言的定义、特点、作用以及它跟方言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关键方言的选择标准；其次，在实践层面将根据斯波斯基（2016）的语言管理域或语言域（language domain）理论，以广东梅州客家话为例来调查我国关键方言的使用现状；最后，根据客家话的使用状况，来反映我国关键方言在各语言域中的使用特点及面临的传承挑战，并依此提出几点有关我国关键方言发展的政策性建议。

2 关键方言的基本概念梳理

2.1 方言的定义、特点以及它与语言标准体的关系

关键方言归根结底还是方言，但它是方言中的重点和核心。因此，要研究关键方言，首先我们要阐明方言的一些基本概念。

第一，多数语言（尤其是国语或官方语言）都有标准体和次标准体（substandard）之分，所谓方言就是指语言的次标准体。对于国家和语言来说，语言的标准体永远都比次标准体更重要，因此，语言标准体的发展（如语言的标准化或规范化）是语言本体规划（corpus planning）的重要内容（库珀，2021），但推广和发展语言的标准体并不是要消灭方言，而是要建立方言之间的沟通桥梁。Chambers 等（2002）[3] 指出，尽管方言是标准语言或规范语言的一种“偏离”（deviation）或“异常”（aberration），可它依然是“语言的一种表现形式，不过，它……地位较低，且往往带有乡村或地方气息，其使用者大多是农民、工人阶级以及其他社会声望不高的人群”。

第二，方言作为一种区域性的口语变体（vernacular variety），虽然在语言地位上比标准体差一些，但它可以代表一种地方身份，具有较好的地方文化特征、地方交际功能和地方群体凝聚力（group solidarity）（Llamas et al.，2007）[82]。也就是说，在一定的地理或群体范围内，方言具有其独特的文化、使用和情感价值，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可、学界的研究和国家的保护。

第三，西方学界在讨论语言（即语言标准体）和方言的关系时有一句经典的话："语言是拥有陆军和海军的方言（A language is a dialect with an army and a navy）。"也就是说，语言来自方言，但只有当方言拥有自己的硬实力时才能成为语言。此外，方言作为语言的次标准体，它跟语言的标准体在许多方面都是相互影响，并能共生共存的。例如，社会上有不少人都是一种或多种方言的使用者（Chambers et al.，2002）[3]，而且，很多人都是先习得了方言，然后才习得语言的标准体。可见，一个人要掌握方言和标准体，既不矛盾，也不困难。英国语言学家 Crystal（2005）[290] 还指出，语言的标准体是众多方言的"综合"或"摘取"（abstraction）。语言犹如河流的水系，语言的标准体是河流的主干，而方言则是支流。主干能量大，活动范围广，但需要众多支流的汇入；而支流尽管能量有限，活动范围较小，但能补充和丰富主干。

2.2 关键方言的定义、作用和选择标准

关键方言，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国家或地方在语言文化、政治经济、信息情报等方面的安全与发展的方言。世界不少国家都拥有众多方言，而尽管其中很多方言都面临衰落的处境，但国家或地方给予方言保护与发展的资金或资源却十分有限，且不少人对方言的态度都较负面。故此，我们需要进行关键方言的研究与规划，即探讨如何在方言的建设和传承上"抓重点或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张治国，2023）[33]。关键方言的研究与规划将有助于提高我们对方言功能的了解与认识，改善我们对方言的态度与行为，尤其是有助于加强我们对重点方言的维持传承和开发利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各种方言的维持与发展。

在关键方言的数量确定方面，其指导思想应该跟关键外语的选择是一样的（张治国，2011）[67]，即从方言多样性和信息安全等角度来说，在国家或地方经济等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关键方言的数量也可尽量多一些，然后再对它们进行分层、分级的发展与管理，以便满足国家或地方的实际之需。关键方言的选择标准是一个学术性挑战，但以下 7 个因素是我们在遴选过程中必须考虑的：使用地域（地理面积是否大，地理位置是否重要）、使用人口（使用人数是否多，使用者当中是否有很多各领域的重量级人物）、地缘政治（使用地是否有足够大的政治影响，是否影响到国家的领土安全）、经济发展（使用地是否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否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发展）、语言文化（该方言是否蕴含丰富的语言、历史和文化资源，是否对语言标准体带来巨大影响）、信息安全（该方言是否具备较高的情报价值，是否影响到国家的信息安全）和海外影响（该方言是否在海外得到较多的使用，是否形成具有海外影响力的言语社区）。

2.3 我国关键方言案例：客家话

中国幅员辽阔，方言众多，其中不仅包括大量汉语方言，而且还包含不少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方言。这些方言是我国语言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也出现了一些弱势方言甚至濒危方言。因此，我们应当开展关键方言研究，并通过关键方言计划，促进大众对方言的认识和保护。纵观世界，美、日两国在外语教学、关键语言计划或是军事情报发展等方面，都没有忽视我国的一些重要方言[①]，我们又还有什么理由不重视、不开发本土的关键方言？

根据上述关键方言的 7 项选择标准，笔者认为，客家话完全有资格成为我国的关键方言。客家话，也称客家方言，是汉语七大方言（也有人说是八或十大方言）之一。客家话是汉语方言中除北方方言以外分布省区最多的方言，广泛地分布于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广西、海南、四川和台湾共 8 个省（自治区）的 200 多个县（市），其中以粤东、粤北、赣南和闽西所形成的地区最为集中，其余的则多以方言岛的形式出现。此外，客家话还随着客家人的海外移民而流传到世界许多地方，如东南亚、欧洲、北美洲（尤其是美国）和南美洲（尤其是苏里南）。如今，客家话成了联系亲人朋友和海外游子的一种语言纽带，它还被誉为汉语发展的活化石，因为客家话蕴含着大量的当地文化和历史印记，是我国方言多样性和丰富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在全世界范围内，有大约 6,500 万的客家话使用者，他们形成了庞大的客家经济，并具有一定的海外影响力（温昌衍 等，2015）。而且，客家话由于与汉语的标准体在发音和词汇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其在关键时刻还可作为战略语言来使用，具有一定的情报价值。

关键方言的研究，要解决好关键方言基本概念的阐明、关键方言的选择和关键方言的发展这三大问题。本文将重点探讨第一项和第三项问题，即在阐明关键方言的基本概念前提下，通过关键方言案例客家话使用情况的调查，来反映中国关键方言当下的生存特点，并提出一些与之相关的维持方略。目前，我国学界对客家话使用状况的调查主要集中于客家话本体，即语音、语法和词汇方面，对客家话语言维持与生存特点内容的调查则鲜见，且在调查视角上还“缺乏对客家地区语言规划、语言政策等问题的探讨”（闫淑惠，2020）[22]。因此，本文拟从语言管理域的角度，来调查客家话在语言维持和生存特点方面的使用状况。

① 例1：据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妄图对付中国的崛起，于2021年成立了“中国任务中心”（The China Mission Center）。该机构除了招聘一些懂得普通话的工作人员（包括间谍）外，还需要招聘一批知晓如下中国方言的人员：上海话、广东话、福建话、客家话、赣方言和湘方言等。例2：美国教育部在2017年列出了78种优先语言（priority language），其中就包括我国的吴方言、粤方言、赣方言和闽方言（转引自张天伟 等，2023）。例3：据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官网，该校把我国的一些汉语方言（如上海话、广东话和闽南话）都列入了其外语课程的名单，并提供这些方言的教学。例4：据2013年人民网消息，日本自卫队第一空挺团“为增进作战和情报搜集能力，每名队员除了学习英语以外，还要学习另外一门外语。……相当一部分队员自修了汉语，包括闽南语”。

3 客家话使用现状的调查设计

3.1 调查的理论框架：语言域

语言或方言的生存与活力可以体现在人类活动的不同物理空间上，学界称之为语言域或语言管理域。斯波斯基（2016）把社会的语言域高度概括为以下十类：家庭域、公共域、学校域、工作域、司法与医疗卫生域、宗教域、军队域、语言活动者群体域、政府域和国际组织域，我们可称之为“语言十域”理论。尽管该理论有时存在语言域难以划分或相互重叠的不足，但它已然囊括了人类主要的社会活动空间，使得抽象和庞杂的语言使用和语言管理空间得以具体化、简便化和可操作化。语言或方言在越多的语言域中得到使用，说明其使用范围越广，活力越大。根据语言的社会功能和地位，语言域可分为高语言域（high status language domain / high domain）和低语言域（low status language domain / low domain），前者指政府部门、国家机构和社会精英所在的领域，如政府域、军队域、学校域和国际组织域，而后者多是私人或大众作为平民百姓所出现的空间，如家庭域、宗教域、公共域、语言活动者群体域。一门语言若能在高语言域中得到使用，说明其语言功能较大，地位较高，反之亦然。可见，语言（包括其变体）的活力、功能和地位可以通过它所生存的语言域的数量和性质来判断（Ager，2005；Ammon，2013）。此外，根据语言使用者的生活，语言域还可分为常见语言域（regular language domain）和特殊语言域（special language domain）。前者是指家庭域、公共域、学校域和工作域，因为这 4 种语言域是我们每个人一生中在很长时间内都要接触到的，具有普遍性。后者则包括司法与医疗卫生域、宗教域、军队域、语言活动者群体域、政府域和国际组织域，这 6 种语言域只是社会上部分人或者多数人仅在部分情况下才会经历的，具有特殊性。

斯波斯基（2016）提出的“语言十域”理论为我们划分了语言管理的十个社会空间，而每个空间的语言管理内容则是他在早些时候（2011）提出的语言政策三成分——语言意识形态（即语言信仰或语言态度）、语言管理（即语言干预）[①]和语言实践（即语言行为）。

3.2 调查地理对象：广东梅州

本文调查的地理对象是广东梅州，理由有二：第一，梅州既是我国古代客家人南迁的最后落脚点，也是明清以来客家人衍播四海的主要出发地，还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客家人聚居区，是客家方言的代表，有“世界客都”之誉；第二，本

① 在西方学界，语言管理有大概念和小概念之分：在斯波斯基的语言域理论以及捷克派学者的研究中，语言管理是个大概念（即广义概念）；但在斯波斯基的语言政策三成分中，语言管理是个小概念（即狭义概念）。详情可参看：张治国，2020. 对语言管理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J]. 外语学刊（3）：92-98.

文作者都是客家人，其中一位家住梅州，这有利于调研工作开展。

梅州位于广东省东北部，地处粤、闽、赣三省交界处，是本省地级市。梅州的社会语库主要有普通话、客家话和外语（尤其是英语），同时，也有少数人会使用粤语、潮汕话等汉语方言。客家话作为一种方言，在梅州各个语言域都要面临同普通话、粤语、潮汕话以及外语的竞争。根据笔者的观察，客家话目前主要用于常见语言域，而在特殊语言域则极少甚至无法得到使用。因此，本文的调查只集中在四个常见语言域。

3.3 调查内容及方法

笔者将采用综合方法来调查客家话在四个常见语言域中所体现的语言活力（详见表 1）。具体而言，我们要搞清楚如下三个问题：各域的人们如何看待客家话（即语言意识形态）？各域对客家话的使用是否有过任何要求或规定（即语言管理）？客家话在各域的实际使用情况如何（即语言实践）？

表 1　客家话使用现状的调查内容及方法[①]

语言域	家庭域	公共域	学校域	工作域
内容	语言信仰、语言管理和实践	语言管理和实践	语言管理和实践	语言管理和实践
方法	问卷法、访谈法	观察法、文献法	观察法、访谈法	访谈法

4　客家话使用现状的调查结果

4.1 家庭域

家庭域面广人多，笔者采用问卷法以获取更大范围的数据，并结合访谈法来获得更具深度的信息。问卷的内容主要围绕语言意识形态（如家庭成员对客家话、普通话、外语的态度）、语言管理（如家长为敦促小孩学习某一语言及其变体所采取的措施）和语言实践（如家庭成员之间的对话语言）三方面来设置。通过微信把问卷发给梅州不同年龄段的常住居民，共收到 189 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 188 份，有效率为 99.47%。此外，笔者还对 2 名中学生（A 和 B）就家庭语言使用情况进行了半结构性访谈。现将问卷和访谈后的结果按照语言意识形态、语言管理和语言实践三部分整理如下。

第一，在语言意识形态方面（见表 2），客家话地位最低，仅有 5.85% 的人最看重客家话，英语最高，普通话居中。这说明多数人在语言信仰上还是看低

① 个人的语言意识形态或语言信仰通常不会因为语言域的改变而改变，但语言管理和实践却会，故语言意识形态的调查仅在家庭域中进行。

客家话。A 同学说：“客家话今后升学用不着考试，而英语和普通话却要。”B 同学则说：“客家话听上去有点土。”可见，对大部分人而言，客家话的经济和文化价值都低于英语和普通话，进而影响着人们的态度，而且年轻人对客家话的情感也不深。

表 2　家庭语言信仰状况（总人数 188 人）

最看重的语言及其变体	外语（英语）	普通话	客家话
人数	99	78	11
占比	52.66%	41.49%	5.85%
排名	1	2	3

第二，在语言管理方面（见表 3），无论父母管理还是自身管理，客家话的管理都是最少的，英语最多，普通话居中。这也不难理解：语言意识形态影响语言行为，既然很多人都认为英语是最重要的，大家就会高度重视英语，并采取与之相应的管理行为。A 同学说：“我父母经常为我报名参加假期英语培训班，却从未关心过我的客家话水平。”B 同学则表示：“我父母经常问我，这个英语怎么说，那个英语怎么讲。不过，我自己也是最重视英语的学习，花时间很多。”

表 3　家庭语言管理状况（总人数 188 人）

管理得最多的语言及其变体		外语（英语）	普通话	客家话
父母管理自己	人数	112	51	25
	占比	59.57%	27.13%	13.30%
自己管理自己	人数	99	78	11
	占比	52.66%	41.49%	5.85%
排名		1	2	3

第三，在语言实践方面（见表 4），客家话是家庭使用最多的（占 83.51％），英语最少，普通话居中。许多家庭虽在语言意识形态上不看好客家话，但在现实中却高频使用客家话，形成理想与现实间的脱节，这也说明客家话在梅州当地家庭语言生活中仍具有强势地位。B 同学的回答也佐证了这一点：“我父母不懂英语，普通话还行，客家话最流利。”

表 4　家庭语言及其变体使用模式（总人数 188 人）

排名	语言及其变体使用（从多到少）	人数	占比
1	客家话 > 普通话 > 外语（英语）	157	83.51%
2	普通话 > 客家话 > 外语（英语）	24	12.77%
3	普通话 > 外语（英语）> 客家话	6	3.19%
4	外语（英语）> 客家话 > 普通话	1	0.53%

此外，我们在分析家庭语言的使用状况时，还要考虑语言的自然代际传承（natural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情况，这对于语言的活力和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实现语言（尤其是方言或小语言）自然代际传承的最佳地方就是家庭域（Fishman，1991）。然而，表 5 说明：客家话的家庭自然代际传承在走下坡路，祖父母一代的客家话水平达到熟练程度的占比最高（96.80%），父母一代则有所下降（86.70%），自己一代就更低了（75.53%）。也就是说，在家庭中几乎每隔一代人（从老到少），能够熟练使用客家话的人数就要下降近 10 个百分点。

表 5　家庭三代客家话水平情况（总人数 188 人）

家庭代际	祖父母		父母		自己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客家话熟练水平	182	96.80%	163	86.70%	142	75.53%
排名	1		2		3	

综上所述，我们可总结出客家话在家庭域的使用特点：同英语和普通话相比，客家话在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管理方面都最为“落后”，这说明客家话在家庭域中的地位和声望都不高，是不受待见的“灰姑娘”。尽管与之相对的，它是家庭域中使用最多和最实用的语言变体，但目前也面临着自然代际传承的问题。

4.2 公共域

公共域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可以是窗口行业，也可以是媒体，还可以是公园、街道和广场等。为了避免出现观察者矛盾（observer’s paradox），笔者采用隐身观察法，分别对梅州的某农贸市场、运动广场、高铁站、机场、现代购物广场和电台的客家话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在这些场所，笔者沿着过道缓走一圈，假装自己是顾客、乘客或休闲者，其实是在“偷听”周边顾客与工作人员之间对话时所用的语言或方言，并用手机逐一记录结果。在媒体方面，笔者通过文献法获得了梅州 FM94.8 新闻广播电台一周的节目单，统计了使用客家话播报的节目

和时间（见表 6）。

表 6　梅州公共域语言和方言使用情况[①]

地点	调查人数（组）/周节目或时间	普通话		客家话		客家话使用排名
		人数（组）	占比	人数（组）	占比	
农贸市场	41	1	2.44%	40	97.56%	1
运动广场	57	14	24.56%	43	75.44%	2
梅州高铁站	40	17	42.50%	23	57.50%	3
梅州机场	20	12	60.00%	8	40.00%	4
现代购物广场	30	19	63.33%	11	36.67%	5
梅州电台	16（周节目）	13	81.25%	3	18.75%	6
	126（周时间）	105	83.33%	21	16.67%	

在语言管理方面，绝大多数的公共域是不会干预个体的语言选择和语言使用的，管理者只有在张贴告示或对公众进行广播通知时，才会管理自身的语言选择和语言使用（即多数情况下使用普通话，有时则使用普通话和客家话双言进行语音通知）。

在语言实践方面，如表 6 所示，不难发现梅州的公共域在客家话使用上总体呈积极态势，但不同性质的公共域体现出不同程度的客家话使用状况：地方化程度越高、越贴近中老年人群生活的公共域，客家话的使用就越多。

客家话在公共域中的使用特点是：第一，在与当地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域（如农贸市场、运动广场），客家话的使用率较高，分别占 97.56% 和 75.44%。第二，在有较多外地人参与的公共域（如高铁站和机场），客家话的使用率略有降低，分别占 57.5% 和 40%。第三，在有较多年轻人和外地人参与的公共域（如现代购物中心），客家话的使用率进一步降低（36.67%）。第四，在媒体（如电台）上，客家话的使用率更低（节目内容和时间长度平均仅占总播送量的 17.71%）。

4.3 学校域

学校域是培养学生语言能力和增强语言活力的最佳场所，任何语言若能进入学校域，说明其地位是较高的。笔者调查了梅州市下辖某县小学及幼儿园在客家话教育方面的情况。根据该县教育局提供的信息，全县共有 59 所小学和幼儿园，其中 15 所会举办有关客家文化（含客家话）的教育活动，占 25.4%。我们参观了

① 在这些公共域只听到普通话和客家话的使用。

其中一所中心小学，并访谈了该小学的 2 名教师（C 和 D）和 2 名学生（E 和 F），此外还访谈了一家幼儿园的 1 名教师（G）。

在语言管理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可见，我国的各级学校在一般情况下都必须使用普通话为教学媒介语。客家话作为方言，一般不可能成为学校的教学媒介语，但梅州的部分学校会通过校本课程或课外活动来提倡客家话的使用。

在语言实践方面，客家话可以结合客家文化成为学校（尤其是幼儿园阶段或小学低年级）的一门选修课程或校本课程。在参观中，笔者发现，该校的本地生源基本会客家话，外地生源则多数不会；在该校教学楼的走廊墙上贴有客家语言文化相关的宣传画。学校提出的办学宗旨是"以客家文化特色为突破口，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现代人"，并开设了与客家文化相关的课程——音乐课，教师会在音乐课中加入客家童谣或客家山歌的内容。此外，学校还会开展有关客家文化的第二课堂，而且还组织学生收集客家谚语，并会推荐学生参加梅州市的客家童谣节。

与此同时，教师 C 和 D 也说出了他们遇到的种种困难。比如，学校在即将接受上级部门检查的时候，才会相对重视客家语言文化课程；课程缺乏教材，教师需要自己去收集材料，且校本教材粗糙；教师授课压力大，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教太多的客家文化知识；甚至教师自己对客家语言文化的了解也不够深入，年轻老师的客家话发音还不够地道。不过，幼儿园教师 G 说："大部分小朋友都会讲客家话……也会讲普通话……课堂上老师比较常讲普通话，偶尔用客家话……幼儿园开设了有关客家方言的课程，老师会教中班和大班的小朋友念客家童谣，还会给小朋友讲客家文化故事，小朋友念得很开心，有时候还会上台表演。"小学生 E 说："我喜欢客家文化课，尤其是音乐课上老师教我们用说唱的形式念客家童谣、唱山歌。"小学生 F 说："我喜欢上客家文化课，喜欢唱客家山歌。"

综上所述，在学校域，仅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小学或幼儿园有一些有关客家话的语言管理行为，主要体现在那些具有客家文化特色的校本课程上，客家话作为客家文化的一部分内容，主要表现为客家童谣、山歌和谚语。即便如此，学校域中有关客家话的语言实践还是比较少的，因此，学生要想在学校域学会客家话和使用客家话是比较困难的，而且，上文的访谈也表明，多数儿童在上学前就已在家庭域或公共域中习得了客家话，他们的客家话能力不是学校教会的。

4.4 工作域

工作域是一个涉及社会众多行业的领域，各行各业间客观存在语言使用上的差别，而这种差别主要与单位性质（如高科技公司与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员工

受教育程度（如大学生多的企业与大学生少的单位）有关。为此，笔者选择了两个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单位：梅州某水泥厂和中国移动梅州某分公司，分别访谈了该水泥厂的 H 先生和该移动分公司的 I 女士。

在语言管理方面，H 先生告知，水泥厂没有具体的文件规定工作时员工必须使用普通话或客家话。I 女士则说，省公司有文件要求员工在召开正式会议的时候必须使用普通话，分公司目前没有专门对员工进行语言方面的培训和要求，公司在招聘新员工时也没有客家话能力的要求，但外地员工入职三年左右后基本都可用客家话与当地顾客交流。

在语言实践方面，H 先生表示，水泥厂在册员工有 400 多人，梅州本地人与外地人的比例大概是 9 比 1，本地员工在入职前基本就都会讲客家话，外地员工则因人而异。在工厂的各种大会上以及各级领导视察工作中，大家一般都讲普通话。员工与老板之间通常用普通话进行交流（因为老板是外地人），本地员工之间则一般用客家话交流，不会客家话的外地员工与本地员工交流时都使用普通话。对外交流时，多数员工会自觉地使用顾客擅长的语言交流（如与本地顾客用客家话，与外地顾客用普通话）。I 女士则说，分公司开会时全部使用普通话，员工与顾客交流时，会根据顾客使用的语言来选择自己的语言，中高层管理人员用普通话交流较多。

综上，我们可以总结客家话在工作域中的使用特点：第一，不同性质的单位会有不同的语言管理行为，但针对客家话的管理不多，即便有，也是出于单位利益的考虑而遵循了商业活动中的顾客语言（customer language）原则（Spolsky，2011）。第二，现代高端产业型单位（如 IT 业和金融业）主要招聘的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其在职场环境中更倾向于使用普通话，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业和水泥生产行业）招聘的大多是当地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倾向于使用客家话。第三，来自本地的员工基本都会客家话，来自外地的员工则大多在几年后逐渐学会了客家话。第四，客家话是低阶语（L. variety），往往用于非正式的口头交流，而书面以及正式的口头交流（如会议、广播、工作汇报）则一般都用普通话。

5　客家话使用现状的分析讨论

窥一斑而知豹，落一叶而知秋。尽管我国目前尚未形成关键方言名单，但可以想见，以广东梅州客家话为代表，关键方言几乎都具有相似的生存现状和使用特点。笔者现根据上述调查结果把客家话在生存和使用方面的几个特点整理如下，并由此推导出我国关键方言的使用特点：

第一，客家话的使用情况在不同的语言域具有不同的表现（详见表 7），其中家庭域中使用最多，接下来依此是公共域、工作域和学校域。通常，我们很难说

清某一关键方言是使用得多还是少，这要根据具体的语言域来判断，通过划分语言域来调查关键方言的使用现状是比较具体和新颖的。同理，关键方言的管理和发展根据语言域来进行，这也是存在学术依据的。

表 7　客家话使用和语言域的关系[①]

语言域	家庭域	公共域	工作域	学校域
使用现状	最多使用	较多使用	有时使用	较少使用
未来发展	★★★★	★★★	★★	★

第二，如表 7 所示，在各个常见语言域中，家庭域在客家话的使用和传承方面表现得最好，未来可期。可见，关键方言的传承和维持离不开家庭域，因为家庭是儿童在语言习得关键期结束之前最主要的生活环境，也是关键方言在传承和维持方面最理想的场所，这里几乎不存在语言歧视和语言身份象征等社会复杂因素的影响。不过，如今家庭域也受到人口流动和家庭语库扩大等因素的影响（张治国，2017），尤其是随着儿童社会接触和社会化角色的增加，父母影响或管理儿童语言的能力和权威都在减弱（Luykx，2005），关键方言区的家庭不使用关键方言的现象在增多。

第三，公共域和工作域是客家话使用与发展仅次于家庭域的重要场域。有些公共域和工作域是当地百姓生活、娱乐和工作的重要场所，适合客家话的使用，但有些公共域和工作域则受环境、人员和工作性质等因素的影响而不太适合使用客家话。关键方言的维持和使用不能仅仅依靠家庭域，也需要部分公共域和工作域的配合和辅助。

第四，学校域是传授知识的地方，与一般老百姓的语言生活关系不大，而且，很多学术性内容难以用客家话准确表达其内涵。因此，客家话在学校域的使用不多，即使有，也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其发展前景不容乐观。关键方言的使用不能太依赖学校域，但可通过在学校域开展关键方言研究、宣传和鼓励，进而推动学生对关键方言的正确认识和择机使用。

第五，从此次研究调查情况来看，客家话的语言意识形态最弱，语言实践最丰富，但若长此以往，客家话的语言维持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因为观点和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行动和行为。可见，要发展关键方言，首先就要认识到关键方言的独特性和必要性，同时，还要加以适当的、合理的关键方言管理，提高关键方言的价值，尤其是经济价值，进而加强大众对关键方言的语言信仰。

① 星级越高，代表未来发展前景越好。

6 结语：有关我国关键方言发展的建议

根据上述客家话使用状况的调查结果及分析，就未来我国关键方言的发展，本文提出如下三点政策性建议。

首先，在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关键方言区出现一些语言转用现象在所难免。在多语多言的选择与竞争背景下，人们大多都会选择价值更大的语言（如普通话、英语等），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我们应从语言管理上加以研究和引导。例如，在关键方言的发展中，我们要重视关键方言的声望建设，以便人们树立更加自信和积极正面的语言意识形态。

其次，要正确处理好关键方言同普通话和外语的关系。关键方言毕竟是属于语言的次标准体，它们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发挥自己的功能，也就是说，它不可能在所有的语言域都具有竞争优势。因此，关键方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家园——常见语言域。另外，应当制定和实施“多语多言”政策，提倡公民提升多语多言水平，只有在这种语言环境下，关键方言才能获得更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最后，要充分利用各个常见语言域的优势和特点来维持和发展关键方言。家庭域可让儿童在自我语言选择前就掌握某一关键方言，而且成本很低，关键方言如果在家庭空间逐渐失守，那便意味着该方言濒临危险，语言之根受到动摇（李宇明，2016）[216]。随着时代的变化，公共域也会给关键方言的生存带来有利的一面，例如，当代社交媒体（尤以微信和抖音为代表）上一些广为传播的内容，促使部分年轻人喜欢上了学方言、说方言和读方言。工作域可提升和发挥关键方言的经济价值，如有些单位要求其窗口部门的服务人员必须掌握某一关键方言，类似这样的管理行为可适当提高关键方言的经济价值。学校域可以从文化、学术等角度为关键方言的发展背书，为关键方言的声望发展出力。总之，应当以家庭域为中心，以公共域和工作域为辅助，以学校域为点缀，形成一个适合关键方言生存的立体语言域，进而为关键方言的维持与发展提供使用空间。

参考文献

董希骁，2023. 中国关键语言：重新阐释与规划建议 [J]. 昆明学院学报（5）：23-29.

库珀，2021. 语言规划与社会变迁 [M]. 赵守辉、钱立锋，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李艳红，2016. 美国关键语言战略实施体系的构建和战略目标 [J]. 外语研究（2）：1-8.

李宇明，2016. 语言竞争试说 [J]. 外语教学与研究（2）：212-225+320.

刘美兰，2016. 美国“关键语言”战略研究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斯波斯基，2011. 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 [M]. 张治国，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 .

斯波斯基，2016. 语言管理 [M]. 张治国，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 .

王建勤，2010. 美国“关键语言”战略与我国国家安全语言战略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2）：7-11.

温昌衍，王秋珺，2015. 客家方言 [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

闫淑惠，2020. 近四十年来客家方言研究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反思 [J]. 赣南师范大学学报（5）：17-23.

张天伟，2015. 我国关键语言战略研究 [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3）：92-96.

张天伟，陈练文，2023. 关键语言的理论思考及其关键度比较 [J]. 昆明学院学报（5）：14-22.

张治国，2011. 中国的关键外语探讨 [J]. 外语教学与研究（1）：66-74+159.

张治国，2017. 家庭语库的不断丰富及其管理 [J]. 语言战略研究（6）：84-85.

张治国，2022. 全球治理视域下我国外语语种规划研究 [J]. 外语教学（4）：1-7.

张治国，2023. 中国关键跨境语言研究 [J]. 昆明学院学报（5）：30-38.

AGER D, 2005. Image and prestige planning[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6(1): 1-43.

AMMON U, 2013. Prestige planning[A]// The encyclopedia of applied linguistic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3.

CHAMBERS J K, TRUGILL P, 2002. Dialectology[M]. Beijing & Cambridge: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RYSTAL D, 2005. How language works[M]. New York: The Overlook Press.

FISHMAN J A, 1991.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 of assistance to threatened languages[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LAMAS C, MULLANY L, STOCKWELL P, 2007.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ociolinguistics[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LUYKX A, 2005. Family language policy in situations of language shift[A]// Proceedings of the 4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ilingualism. Somerville: Cascadilla Press: 1407-1414.

SPOLSKY B, 2021. Rethinking language policy[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简介

张治国，博士，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语言政策及规划。电子邮箱：zgzhang@shmtu.edu.cn。

胡舒琪，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领域：儿童语言习得及语言政策。电子邮箱：charis128@126.com。

（责任编辑：王伶）

and-guidance role, among other measures.

Keywords: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smart educ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optimization path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Multilingual Hong Ko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in-Education Policy and Planning

WEN Xu; ZHOU Xian

Abstract: In an era of rapid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demand for multilingual talents equipped with international vision and strong national consciousness has never been more pronounced. This research, grounded in comprehensive statistical evidence from Hong Kong's language environment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elucidates the imperative of raising national consciousness by further implementation of a rational language-in-education policy and planning. This research emphasizes the necessity for Hong Kong to actively integrate into the country's overall development, and advocates for effective measures aiming at enhancing national consciousness. This includes prioritizing elaboration in history and culture education, promoting Putonghua proficiency, encouraging inter-regional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deepening scientific exploration.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research extend beyond Hong Kong, offering insights into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in other multilingual regions facing similar challenges.

Keywords: language education;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national consciousness; Hong Kong

Exploring Critical Dialects and Investigating the Use of Critical Dialects in China: A Case of Hakka

ZHANG Zhiguo; HU Shuqi

Abstract: After putting forward a system of critical languages, one kind of which is critical dialects, this paper sheds light on the basic theoretical concepts of critical dialects, on the basis of which we infer that Hakka belongs to China's critical dialects. Then, the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use of Hakka in Meizhou of Guangdong Province, via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language domain by Spolsky. The result shows that Hakka is used chiefly in regular language domains, with its vitality decreasing in the order of family, public space, workplace, and school domains, and also with its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declining. Finally, the authors argue that it is highly necessary for us to do the following things: One, it is highly necessary to conduct academic research and planning about critical dialects in China. Two, many minority languages and dialects are shrinking in terms of use and users; they ought to be looked after. Three, the vitality of critical dialects including Hakka in China has to rely on the aforementioned regular domains, and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building of prestige for

critical dialects, so as to improve people's language awareness about dialects.

Keywords: critical dialect; language maintenance; language domain; Hakka; Meizhou of Guangdong Province

Developing a Language Service Cooperation Model for Major International Sports Ev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l Systems Theory: A Case Study of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REN Wen; ZHAO Tianyuan; CHEN Jingyi

Abstract: Language services are a cornerstone of major international sports events, playing a pivotal role in facilitating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ve work across various sectors, while maintaining the coherence and self-sustaining capacity of the event. The language service team of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delivered high-quality language services throughout the Games, creating a valuable Olympic legacy. However, this legacy lacks in-depth analysis and comprehensive synthesis. Addressing this gap, the present study draws on General Systems Theory to engage in thorough research, including the examination of related documents, conducting interviews, and administering surveys to staff and volunteers of the language service team at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This research distills the cooperative operational mechanisms and identifies areas for improvement. Furthermore, the study proposes a "four-entity, five-dimension, three-stage" cooperation model for language services in major international sports events.

Keywords: major international sports events;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language services; Cooperation Model; General Systems Theory

Discursive Features of Language Policy and Its Analytical Dimensions

ZHAO Peng

Abstract: The study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draws on the theoretical principles of critical discourse research to develop a "discursive study of language policy" approach. Following the trend, this paper discusses discursive features of language policy in terms of practice, historicity and meta-discourse. And, drawing on the theoretical principles of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it proposes three analytical dimensions, namely, the textual features, discursive interaction, and social change. We hope these dimensions are taken into account when language policy as discourse is explored, and our discussion serves as a reflection on doing language policy research from a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Keywords: language policy;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discursive features; analytical dimensions